

经
典
国民
阅读

诗经译注

周振甫 译注

中华书局



诗经译注

周振甫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译注 / 周振甫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7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09341 - 4

I.诗… II.周… III.①古体诗—诗集—中国—春秋时代②《诗经》—译文③《诗经》—注释 IV.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87120 号

书 名 诗经译注

译 注 者 周振甫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石 玉

装帧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⁵/₈ 字数 404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341 - 4

定 价 42.00 元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

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引 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代称为《诗》，都称有三百多首。孔子称为“《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墨子·公孟篇》里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大概当时传的《诗》就只有三百零五首，举成数说，只说三百首了。到了汉朝，尊称《诗》为经，才有《诗经》的称呼。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

这部《诗》是谁编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是把删诗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的

删定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配上音乐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中的《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作为《风》、《小雅》、《大雅》、《颂》的开始，认为这四首诗有关于王道的开始，也始于孔子，把一切有关于《诗经》的事都归到孔子身上。其实孔子没有说过诗三千余篇的话，没有说过删诗的话。《诗》到孔子手里，只有三百余篇。这三百篇都已配上音乐，音乐也不是孔子配的。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那时《诗》的《雅》、《颂》上原配的音乐已经散乱了，这时孔子才加以整理，所以说孔子给《诗》配上音乐是不对的。把《诗》中的《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作为《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开始，是编《诗》的人这样安排的。《诗》既不是孔子编的，这样安排也不是孔子的。把这样安排称为“四始”，说是有他的用意，是《毛诗》的话，也不出于孔子。因此，司马迁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到了宋朝，朱熹写《诗集传·序》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

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决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朱熹讲的话，结合他的认识，实际上同司马迁的推重孔子是一样的。司马迁讲孔子删《诗》，朱熹也讲孔子删《诗》。司马迁讲孔子用《诗》作为王者政治的开始，朱熹也有这个意思。朱熹说“而圣人取之”，就是说孔子取之，实际上是说《诗》是孔子编定的，只是不提孔子罢了。朱熹在《诗集传》上讲到《商颂》时，说：“至孔子编《诗》而已亡其七篇。”是说《商颂》本十二篇，“亡其七篇”，只剩了五篇，这里明确地提了“孔子编《诗》”，承认《诗》是孔子编的。

两次编《诗》

孔子有没有删《诗》，有没有编《诗》呢？清方玉润《诗

经原始·自序》说：“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惟《豳》次《齐》，《秦》又次《豳》，小异），其时孔子年甫八岁。迨杏坛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厥后自卫反鲁，年近七十。乐传既久，未免残缺失次，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尝有删《诗》说哉？”孔子既没有删《诗》，也没有编《诗》，那末《诗经》是谁编的呢？说《诗》是谁编的，已无法考证，只能考《诗》是哪个机关编的。当时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来聘问，他知道周朝把周乐送给鲁国，就向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请求一观周乐。周乐用《诗》的《风》、《雅》、《颂》作为歌辞，所以季札听了周乐，也听了《诗》的《风》、《雅》、《颂》。编周乐的周朝大乐官也把《诗》编成《风》、《雅》、《颂》，他是按照《风》、《小雅》、《大雅》、《颂》的次序排列的。《风》是十五国，他把十五国的歌谣排在第一，这是很难得的。当时周朝有采诗的官，周朝可以派他到十五个诸侯国去采集歌谣。像鲁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就不能派官到各个诸侯国去采集了。所以说孔子编《诗》是不对的。方玉润《诗经原始》谈《邶风》说：“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鄘始封及后何时并入于卫，诸家均未详。”“惟邶、鄘地既入卫，《诗》多卫诗，而犹系其故国之名，且编之卫国前，《序》与

《传》都莫名其故。……范氏处义曰：‘先《邶》而后《鄘》者，岂以其亡之先后欤？’”季札听了邶、鄘、卫诗，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原来邶、鄘已并入卫，已没有了。可是周代编《诗》的乐官不承认卫国并吞了邶、鄘，还写明是《邶风》、《鄘风》。

再看方玉润论《唐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十七传至晋侯缙，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灭晋之宗而不能灭唐之号，能冒晋之号而不能继唐之统。君子欲绝武公于晋而不可，故总名其诗为唐以寓意焉。”

再看方玉润讲《商颂》：“愚谓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而乃先周而后商者，何哉？盖先周者，尊本朝，后商者，溯诗源，编《诗》体例应如是耳。”

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就听到许多诗看，从方玉润论邶、鄘风诗及《唐风》、《商颂》诗看，知第一组编《诗》的人就是编周乐的周朝乐官。从季札观周乐看，季札在听到《齐风》后，就听《豳风》，他听了《豳风》说：“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大概季札听的《豳风》，只有《七月》一首诗，下面的《鸛鸣》诗他没有听到。《鸛鸣》诗说：“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哢哢。”倘季札听到这诗，谈不上“乐”了。倘季札听《豳风》，只听见《七月》一首诗，那把它放在《齐风》后面，没有不合。不过鲁国的乐官听了，

一定很不满意，把相传周公作的诗附在后面，成了方玉润讲的《豳风》。方玉润说：“案《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此。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穡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至《鸛鸣》、《东山》二诗，乃为公作。《伐柯》、《破斧》、《九罭》、《狼跋》则又众人为公而作之诗。以其无所系属，故并附《七月》后，而统而名之曰《豳》，凡以为公故也。……且诗以《风》名，有正不能无变，既滴又当返淳。天下淳风，无过农民，此《七月》之诗所以必居变风之末者也。……”这是又一次编《诗》，当出于鲁乐官之手。孔子在季札观周乐时只有八岁，未必参与第二次改编的事。第一次编《诗》的本子既到了鲁国，鲁国的乐官听了季札的评《豳风》，一定很不满意，把相传周公作和他人为周公作的诗，附在《七月》后，按照方玉润说的道理，把《豳风》放在十二国风最后，可能是出于鲁国乐师之手。这是第二次的改编。

孔子论《诗》

孔子以《诗》教人，《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熹注：“言三百者，举大数也。蔽犹盖也。‘思无邪’，《鲁颂·駉》篇之辞，凡《诗》

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盖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朱熹注：“《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骇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从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孔子教儿子孔鲤学《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外交官，都用念《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不念《诗》，在外交上不能说话，念《诗》可以供外交上发言之用。

《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汝）为《周南》、《召南》矣夫，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朱熹注：“《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说明孔子极看重《周南》、《召南》。孔子所以看重二南，因为二南的诗，是接受周文王教化的。周文王的教化，是实行王道的。可见孔子讲《诗》，是从实行王道来的。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感发志意），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绪

余又足以资多识)。”朱熹注：“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注：“放谓禁绝之。郑声，郑国之音。佞人，卑谄辩给之人。殆，危也。”《论语正义》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举歌相感，故云‘郑声淫’。非谓郑诗皆是如此。”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朱熹注：“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孔子论“放郑声”、“郑声淫”，《论语正义》以郑声指郑国之俗，而不以指郑国之诗，极善，是孔子非放逐郑诗也。孔子之正《雅》、《颂》，是在《雅》、《颂》放废以后。孔子不言四始，则司马迁论孔子言四始及弦歌三百五篇皆非其实矣。

三家《诗》与《毛诗》

汉时言《诗》有鲁、齐、韩三家《诗》，后又有《毛诗》。三家《诗》，据《史记·儒林列传》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又称：“申公者，鲁人也。……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

独王（鲁恭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轅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名婴），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焉。……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郑玄《诗谱》：“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萇。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萇谓小毛公。”

这样，西汉讲《诗经》的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都列于学官。三家的书，用今文写的，即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还有《毛诗》，没有立于学官，是用古文写的，即用周代的文字写的。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说：“《诗》则鲁、齐、韩三家立学官，独毛以古文鸣。献王以其

为河间博士也，颇左右之。刘子骏（歆）名好古文，尝欲立《毛诗》，然其《移太常书》，仅《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三事而已。东汉之季，古文大兴，康成（郑玄）兼通今古，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凌三家。盖毛之诂训，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世少尊信者。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以宗郑者唾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众煦漂山，聚蚊成雷，乃至学问之途，亦与人事一辙。君子观于古今盛衰兴亡之故，可不为长叹息哉！”那末，王先谦讲《毛诗》突出的不同于三家《诗》而错误的是什么呢？他说：“《毛传》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羸入《大序》之中。”“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毛诗》在《诗大序》中插入一段说：“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风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原来从《关雎》到《麟之趾》十一篇诗叫《周南》，从《鹊巢》到《驺虞》十四篇诗叫《召南》。《周南》是指周公领导的南国，《召南》是指召公领导的南国，所以成为两个南国，占十五《国风》之二。照《毛诗》的讲法，不作为二个南国，就少了两国，成为十三《国风》，就不对了。《毛诗》第一句话，像《羔裘》，《毛诗序》说：“刺朝也。”《女曰鸡鸣》，《毛诗序》

说：“刺不说德也。”《鸛鳴》，《毛诗序》说：“刺不壹也。”《楚茨》，《毛诗序》说：“刺幽王也。”《信南山》，《毛诗序》说：“刺幽王也。”《甫田》，《毛诗序》说：“刺幽王也。”《瞻彼洛矣》，《毛诗序》说：“刺幽王也。”……“《楚茨》以下诸篇，毛以为‘刺幽王’者，篇中皆无刺义。”这是《毛诗序》的不可信的第二点。又称：“《关雎》之为刺，三家《诗》说并同。《琴操》、《驹虞》、《鹿鸣》诸篇，亦与众说相应，无一家独自立异者，虽旧文散落，大致尚堪寻绎。而毛于《关雎》、《驹虞》别创新说，又以《驹虞》配《麟趾》为《鹊巢》之应，私意牵合，一任自为，其居心实为妄缪，宜刘子骏不敢以之责太常也。”这是说《毛诗》别创新说，私意牵合，实不可信，三也。又说：“《毛诗》则诡名子夏，而传授茫昧，姓名参错，其大旨与三家歧异者凡数十，即与古书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为郑偏好。诸家既废，苟欲读《诗》，舍毛无从。抚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睹遗文而长叹，是以穷经之士讨论三家遗说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陈氏，最为详洽。”从后面的文章看，他是讲陈乔枏。这样看来，不论是陈乔枏或王先谦，研究三家《诗》的，都想纠正《毛诗》的误解，求得三家《诗》的解释，以求正确解《诗》。

朱熹和方玉润

研究三家《诗》的人想借三家《诗》来纠正《毛诗》的错误，但三家《诗》有的同《毛诗》一样错了，怎么办？这

时有朱熹来纠正。但朱熹也有错的，怎么办？就靠方玉润来纠正。方玉润也有不明白的，只好靠其他人了。比方《周南》的《卷耳》诗，第一章说：“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置）彼周行。”“我”指妇人，这个妇人拿着顷筐采卷耳，不满顷筐，因为怀人，把顷筐放在大路上。可是《鲁诗》说：“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把“怀人”解作“思古君子”，把“彼”指“贤人”，把“周行”解作周朝的官的行列，说成“置之列位”。说明《鲁诗》全错了。朱熹把“周行”解作“大路”，对了。但诗的第二章说：“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朱熹说：“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罢（疲）病而不能进，于是初酌金罍之酒，而欲不至于长以为念也。”第二章里有两个“我”字，朱熹把第二章的两个“我”字说成即第一章的“我”，认为妇人上山，错了。方玉润说：“故愚谓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则求贤官人之意，亦无不可通也。”方玉润认为是“妇人念夫行役”，则诗第二章中的两个“我”指丈夫说的，纠正了朱熹的错误。但说：“则求贤官人之意，亦无不可通也。”这是回到第一章说“周行”是周朝官的行列，又错了。“周行”指大路，是朱熹的正确解释。即朱熹对诗的第一章解释对了，对第二章的两个“我”字解错了。方玉润对第二章解释对了，对第一章解释错了。只有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卷耳》的解释，认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第一章写妇人，第二章写丈